



考古学视域下的张姓起源新证

杜金鹏

摘要:张是汉族姓氏之一,在《百家姓》中排第24位。据统计,张姓是当前第三大姓,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关于张姓的起源,古今说法各异。现有文献、文物、考古学资料证明,张姓始祖可追溯到商周时代。殷墟亚长墓青铜器铭文中作为族徽的“𠂔”与本作为私名、后演变为族名的“长”共存,“张”字的两个构字要素已经具备。鹿邑长子口墓之主人“长子口”,属于殷墟“亚长”的后裔,可证“长”族延续到西周早期。西周青铜器铭文和《诗》文证实西周晚期已有张姓。春秋战国时代,张姓已广泛分布于我国北方地区。张姓作为汉族姓氏,其起源却来自商代周边族群,后来融合发展为汉族的一部分。殷墟亚长墓和鹿邑长子口墓的发现,以确凿的考古学证据表明,这一过程的早期关键环节在中原地区形成,河南是张姓起源信而有征的考古学起点。

关键词:考古学;张姓起源;新证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6)03-0005-10

张姓为中国的大姓之一,在成文于北宋初年的《百家姓》中排名第24位。据统计,当代张姓人口已经超过9500万人,是我国第三大姓,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关于张姓的起源,古今说法各异。传统的姓氏起源研究,多以谱牒、方志、民间传说和传世文献为资料来源,其间颇多错讹之处,导致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不高。本文结合现有文献、文物、考古学资料,认为张姓始祖最早可追溯到商周时代。

一、古文献所见张姓

《世本·作篇》云:“挥作弓。”^[1]《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曰:“张氏出自姬姓,黄帝子少昊青阳氏第五子挥为弓正,始制弓矢,子孙赐姓张氏。”^[2]从古文献学角度看,张姓始见于西周。《诗·小雅·六月》云:“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饮御诸友,鱼鳖脍鲤。侯谁在矣?”

张仲孝友。”《郑笺》曰:“侯,维也。张仲,贤臣也。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孔疏》云:“《尔雅》李巡注云:‘张,姓。仲,字。其人孝故称孝友。’”^[3]诗颂周宣王令大将尹吉甫率兵讨伐玁狁至于太原(今甘肃平凉一带),凯旋而归,吉甫设宴庆贺,宴客中有好友张仲,张仲亦为宣王大臣。

春秋时张姓多见。如《左传》中便有张侯(成公二年)、张老(襄公三年)、张武(襄公二十三年)、张句(昭公二十一年)、张柳朔(哀公五年)等。战国张姓则有张丑(燕国人质,《战国策·燕策三》)、张仪(魏国人,《史记·张仪列传》)、张禄(范雎,魏国人,投秦改姓名,《史记·范雎列传》)、张良(韩国人,《史记·留侯世家》)等。

二、金石学证见张姓

北宋金石学家刘敞,在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出任永兴军,驻今西安一带,其间收集

收稿日期:2026-03-04

作者简介:杜金鹏,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101),主要从事夏商周考古、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古铜器数十件,择11件优良者绘图、制文,著成《先秦古器记》,刻于石上。其在长安购得周代青铜器张仲簋,器有铭文50余字,记录张仲参加周宣王庆祝北伐猃狁胜利的宴会。他备感荣幸,故择优质铜料铸造该器以为纪念。铭文首句为“张仲作宝簋”,末句是“张仲眉寿”,其中作器者名字写作“𠄎”,吕大临《考古图》著录该器和铭,题名《𠄎仲簋》,释“𠄎”为“𠄎仲”,并谓“《诗·六月》卒章曰‘侯谁在矣?张仲孝友’,盖周宣王时人也”。张、𠄎同音相通,故而将器铭

“𠄎中”与《诗·六月》中“张仲”相联系^①。另有两件张仲簋,系西汉古文字学家张敞得之于蓝田,形制、尺寸、铭文完全相同,为对器,原载于北宋欧阳修所著《集古录》^②,有铭拓与释文,欧阳修将铭文“𠄎”释作“张仲”。《考古图》转载附录其铭文与释文^③。南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引用了《考古图》之《张仲簋》铭文,释文将“𠄎”隶作“张仲”(图1);又引《古器物铭》之《张仲簋》、《兰亭帖》之《张仲簋》各一件,铭文内容与《考古图》之《张仲簋》相同,释文亦同^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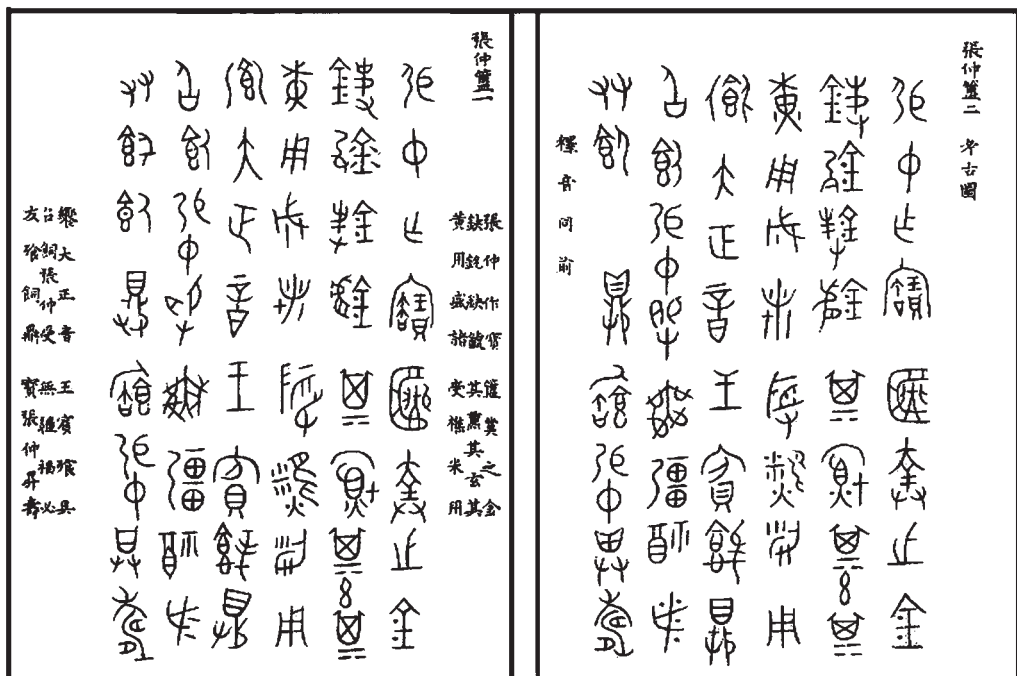


图1 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之《张仲簋》铭文

另外,《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中又著录有西周《张伯匜》,铭文“张伯作旅匜,其子孙永宝用”,“张伯”写作“𠄎”。薛尚功记曰:“按刘原父《先秦古器记》云:‘按其铭曰张伯作旅匜,张伯不知何世人,似亦张仲昆弟矣。’”^[4]张伯、张仲,兄弟之属,刘敞所言可信。清孙诒让《古籀拾遗》考释《张仲簋》铭文时,认为铭文中“𠄎”字《考古图》释为“𠄎”是错误的,而应隶作“张”,采纳了欧阳修、薛尚功的意见^⑤。可见,古代金石学家释“𠄎”为“张”是主流观点。

如果将《张仲簋》铭文与《诗·六月》相联系,当以释作“张”为是。理由有三:其一,《张仲簋》与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考古发掘出土的两件

《虢季簋》(M2001:77、78)形制相同,年代应当相当。《虢季簋》出土于虢国墓地M2001,为对器,铭文8字“虢季乍(作)匜(簋)宝永宝用”。据研究,此墓主人虢季为周宣王、幽王时期虢国国君^⑥。因此,张仲簋的时代为周宣王时期,与张仲的在世时间相符。其二,《张仲簋》铭文“张仲受无疆福,必友”之辞,与《诗经·六月》“张仲孝友”正和。其三,《诗经·六月》尹吉甫“饮御诸友……张仲孝友”与《张仲簋》铭文“王宾飨具召饮,张仲受无疆福”,皆为张仲参加庆功宴会之记录,铜器铭文与《诗经》文之史实相符。这是西周青铜器铭文中难得的西周晚期有张姓之证据。

三、考古学资料所见张姓起源

(一) 郑韩故城战国铜戈铭文所见“长”与张姓

1971年在郑韩故城外郭城内发现一处战国晚期青铜兵器窖藏坑,出土一批青铜兵器。其中有2件铜戈的铭文,文字结构大致相同(图2),《四年戈》(T1:22)铭文云:“四年,郑令韩半,司寇长朱,武库工师弗恣,冶尹岐(披)造。”《五年戈》(T1:27)铭文云:“五年,郑令韩半,司寇张朱,右库工师皂高,冶尹孺造。”^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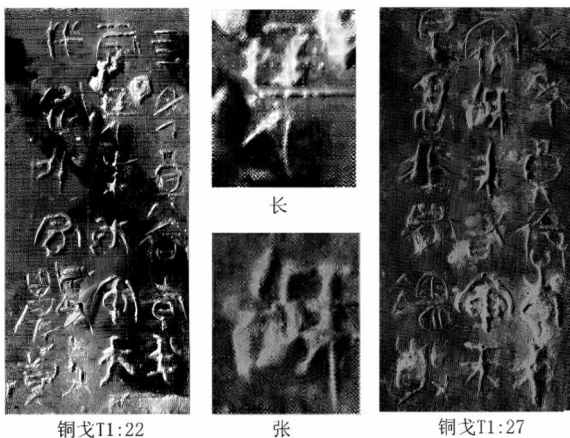


图2 郑韩故城出土战国铜戈铭文

这批青铜兵器的资料发表者郝本性认为,“四年戈”至“八年戈”之间有衔接关系,很可能是韩王安四年至八年期间铸造的系列兵器。铭文中的“郑令”为郑邑(县)县令,“郑令”“司寇”是兵器的督造者、监管者,“武库工师”“右库工师”为监工,“冶尹”是冶铸工主管。在《四年戈》铭文隶定时,郝本性直接将“长”字释作“张”,即认为司寇“长朱”亦即“张朱”,“长”为“张”之省^⑧。这是战国时期“长”“张”相通,“长”为“张”之初文的实证。

1973年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战国晚期“九年将军张戈”,其铭文曰:“九年,将军张二月,剡宫我其献。”^⑨这是战国时代有张姓的又一考古实证。

(二) 鹿邑长子口墓所见长姓

1997—1998年,在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太清宫遗址发现一座西周初年墓葬,该墓为有南北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一椁一棺,椁室呈“亞”字形,棺为长方形。墓主人为60岁左右

男性,殉葬14人。墓中随葬品非常丰富,包括陶器197件,瓷器12件,青铜器235件(礼器79件、乐器6件、兵器46件、工具14件、车马器78件、杂器12件),玉器104件(礼器52件、兵器11件、工具文具等4件、装饰品37件),石器5件,骨器500多件[包括骨簇425件、骨管5件、骨卡子(璲)8件、骨叉形器(弓弭)1件等],石子24枚^⑩。

该墓出土的铜器中,有39器铭文中“长子口”,应为墓主姓名。长应是氏族或国名,子是身份或爵位,口为私名(图3)。有学者指出,卜辞中的“长子”,一称长侯或长伯,应是商王朝的藩属^⑪。发掘者认为:“长子口”是殷遗民,生活在商末周初,在商为高级贵族,在周仍有很高社会地位,为一地的封君。“卜辞上的长子很可能就是长子口的祖父辈。有学者研究,长氏原为东夷的后裔,臣服于商后,负责制造弓箭等武器,后来繁衍为张姓,故长氏是张姓祖先。”^[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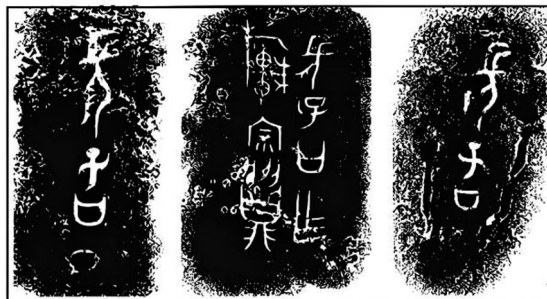


图3 长子口墓青铜器铭文“长子口”

这是从考古学上把张姓起源前推至西周早期。由于是考古发掘报告,作者没有就张姓起源进行过多讨论,故其“长氏是张姓祖先”的观点论述不够深入,在此试做补充论述。长子口墓墓主人,在当时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随葬铜鼎22件,铜觚、铜爵皆8件,加上2件仿铜器的陶觚、爵,应该是10套觚爵,此外还有2件铜角。随葬铜兵器有铜钺1件、铜戈5件、铜刀2件、铜剑1件、铜弓弣3件、铜镞32枚、铜盾饰2件。玉兵器则有玉钺1件、玉戈8件、玉镞1枚。骨兵器包括骨簇425枚、骨璲8件、骨管3件、骨弣器1件,皆属弓箭类兵器。可见,墓主人“长子口”是一位拥有铜钺、玉钺的高级军事将领。该墓还出土一套青铜工具,包括铜斧2件、铜斨2件、铜凿1件、铜铲3件、铜削5件。由此可见,墓主人还是手工业从业者——应该是

掌握高端生产工具的管理者。

关于发掘报告中所说骨制“卡子”和“叉子”，发掘者说：“这种‘卡子’，以前极少发现。究其用途，我们原认为是连接两件物体的‘扣’，但中间的凹槽很不规则，有些很浅，似钓鱼用的漂子，即‘鱼浮’。它们均被置于椁室，却又不似椁上构件。”“叉形器在安阳殷墟出土较多，大部分出在侯家庄的几座大墓中，被称为‘搬子’，其用途不明。”^{[5]187}其实，这种“卡子”就是用来解挂弓弦的专用器具，在殷墟常有出土，一般作龙形或鱼形，有玉质、牙质、骨质多种。笔者认为这类器物可称为“璫”^⑩。至于“叉形器”，属于弓末饰，即所谓“弭”，殷墟考古发现已经证实^⑪。

根据郑韩故城战国铜戈铭文“长”“张”相通，该墓铜器铭文屡屡记明墓主人为“长子口”，同时出土大量与弓箭相关的文物，印证了发掘者说长子口“负责制造弓箭等武器，后来繁衍为张姓”的推论，这一观点便有了相当高的可信度。

(三)殷墟亚长墓所见“弓”与“长”

2000年12月至2001年2月，考古工作者在殷墟花园庄发掘了一座商代墓葬花园庄M54^⑫。该墓位于殷墟宫殿区南部，北距宫殿建筑群约300米，其位置十分显赫。墓圻面积达25平方米，有一棺一椁，共有人牲9人，殉人6人，殉狗15只。

据研究，M54墓主人为35岁左右男性。从其骨骼痕迹看，其生前曾多次负伤：左股骨曾遭刀斧类兵器砍伤；左肱骨有3处砍伤；左肋骨有锐器砍伤痕迹；右侧髌骨有穿透性创伤，系矛戈类兵器所致。左臂上的3处创伤未见骨骼自我修复痕迹，表明这3处创伤与墓主人死亡时间相近。从其受伤位置推测，墓主人在战斗中习惯使用右手拿兵器，因此对于左侧的防护较为薄弱。累累伤痕，也充分证明墓主人是惯战武将，甚至死于战场，故享有崇高的礼遇^⑬。

墓中出土各类随葬品1600多件，其中玉石器230件，陶器20多件。墓中随葬大量青铜礼器，证明墓主人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随葬大量青铜兵器，包括7件钺，说明墓主人是一位军事将领；随葬一套青铜工具（在殷墟，铜铤、凿、铲是手工业高级管理者的“标配”，几乎适用于各个门类手工业），说明墓主人还是手工业主（高

级管理者）。可见，墓主人具有多重显赫身份。

墓中出土的青铜“手形器”（M54:392）位于墓主人左小腿外侧，作五指张开半握状，有简化饕餮纹，其臂部中空，可纳木柄，通高13厘米^⑭。关于该器的物性、用途，学者有不同解读。笔者根据它的形制和出土位置，以及墓主人身体状况等，认为它应该是杖首，即安置在木杖顶端的装饰物。

据统计，花园庄M54出土青铜器中有131件具有铭文。其中，有铭容器27件，铭文主要是“亚长”二字，个别简省为“长”或“亚”；3件铜铙皆铭“亚长”；1件铜钺上铭“亚长”，5件铜钺上用绿松石镶嵌出“亚长”二字；3件卷首铜刀皆铭“亚长”；40件铜戈上铭“亚长”，1件铜戈铭“𠂇”；50件铜矛上铭“亚长”；1件铜弓附上用绿松石镶嵌出“亚长”二字（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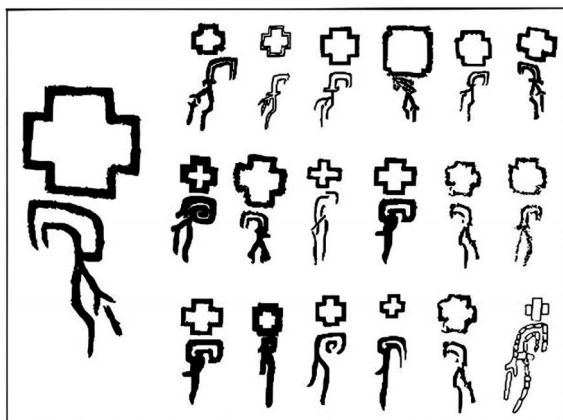


图4 殷墟亚长墓铜器“亚长”铭(嵌)文

显然，“亚长”是墓主人的身份名号。亚，为武官职称。长，是墓主人的族名或私名。发掘者据此推定说M54墓主为长姓高级贵族，因此，可把殷墟花园庄M54号墓称为“亚长墓”。

殷墟甲骨文中“长”字（图5）。廩辛、康丁时期卜辞中见有“长子”，记录“长子”向商王贡献龟甲等事迹：

其侑𠂇(长)子，𠂇龟至，王受祐（《合》^⑮ 27641）

乙未……𠂇(长)……不……（《合》 28195）

卜辞中还有一字“𠂇”，学者也有释作“长”者，见于卜辞中用作地名和宗庙名：

辛丑卜，旁贞，𠂇(长)宗（《合》13545正）

……丑卜,宀贞,𠄎(长)宗 (《合》13546)
 𠄎(长)受年 (《合》22247)
 ……取𠄎(长)…… (《怀》^⑧7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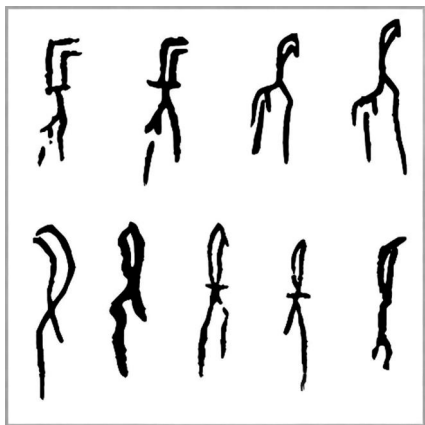


图5 甲骨文“长”字

很显然,殷商甲骨文和金文之“长”字,乃披发、拄杖之人的象形字。披发不笄,即头发披散不绾。拄杖,手持拐杖。上文提到的亚长墓出土的手形铜器,该器下部有銎,可纳木杆,应该就是一件手杖。联系到亚长的腿、臂皆曾遭受严重创伤,可能行走不便,只能依杖而行。如此,“长”字应该是专为亚长本人创制,是其专有名字。这应该是一个合理的解释。后来,“长”衍化为亚长所在族群的族名。

目前,殷墟青铜器铭文中的“长”仅见于亚长墓。现有考古学证据表明,亚长墓主人“亚长”,与商族、商王室有着密切关系。这从其墓葬坐落在商王宫殿建筑附近已可见一斑。其墓葬规格(包括墓室面积、人牲人殉数量)均与妇好墓大致相当。而其墓底使用了一组“警卫”人员,其首领甚至执有一件玉(石)钺,效仿了商王陵墓的制度。亚长墓的埋葬制度和习俗,包括棺槨制度,人牲、人殉和殉狗,甚至使用腰坑,与殷商贵族几乎一样。“亚长”墓中随葬了大量商人所钟情的青铜器、玉器,有铜铙和石磬,还有一组商人习惯使用的陶器。显然,“亚长”接受了商族的许多文化传统——包括礼乐文化。可以认为,“亚长”在坚守本族少量特有礼俗的同时,已经深度“商化”。

但是,亚长墓又确实具有与商人不同的礼俗和用具。

第一,不使用瓚玉。我们知道,考古发现的

所谓玉石“柄形器”,看似不起眼但实际上是三代的重要礼器,早在二里头文化时期,玉柄形器便承担了基本玉礼器的角色——一座墓之中若只有一件玉礼器,必为“柄形器”。只是学界对其功用一直不得其解,称名也五花八门。后来,因一件出自殷墟的商代玉柄形器刻铭,人们才得以真正认识这种玉器。据传于20世纪30年代在殷墟被盗掘出土的一件“小臣鬻”玉柄形器,有刻铭曰:“乙亥,王易(赐)小臣鬻鬻,才(在)大室。”^[6]鬻字,学者一般隶定为“鬻”字。李学勤考证认为,“鬻”当即柄形器自名,应读为古文献所见之“瓚”^⑨。笔者曾撰文认为,所谓“柄形器”就是文献所说行裸礼使用的礼器“瓚”之玉柄^⑩,可称为“瓚玉”。在商代,裸礼是一种十分隆重的祭祀礼仪,卜辞中多有记录。郑州商城、殷墟等商代遗址的墓葬中经常出土瓚玉,妇好墓出土瓚玉41件^⑪,殷墟王陵中也出土大量此类文物,因而成为殷商文化的代表性玉礼器。因此,是否拥有、使用瓚玉,可作为判别上层社会人物族属的标志。

第二,不拥有和使用发笄。商人习用发笄,已为殷墟甲骨文和墓葬发掘所充分证明,殷墟制骨作坊也出土大量骨笄(成品和半成品)。可以说,束发戴笄是商人的显著习俗。如甲骨文表示男人的“夫”字,与女性相关的“女”“妃”“妹”“婢”“娥”“妍”字,都是人头着笄形(图6)。



图6 殷墟甲骨文表戴笄之人象形字

妇好墓出土玉笄28支、骨笄499支^⑫。郭家庄M160棺内随葬有玉笄1支,系墓主人所有,制作精致。椁室内出土骨笄3支,出自殉葬人头顶,制作粗糙,未经打磨。出土玉瓚柄8件、石瓚柄1件^⑬。小屯M18出土玉笄2支(头前左右)、骨笄25支(成排布列于头顶,似所谓“笄冠”)、玉瓚柄1件^⑭。小屯M331出土玉笄50支,骨笄15支,玉瓚柄7件^⑮。

按前文所述,亚长并不使用笄和瓚柄,易言

之,他没有从事裸礼的习俗,也没有以笄束发的习惯。商代人们有以笄束发之习惯,应毋庸置疑,但在殷墟殷商墓葬中,真正发现头顶置笄者,却并不普遍。也许当时的葬仪中有入葬时去除头笄的习俗。古文献中便有死者入殓以桑木笄绾发的记载。值得注意的是,亚长墓铜器铭文中“长”字为长发飘逸、手执杖状物之人形。而考古发现墓主人确实不用发笄,且随葬一件木柄手形铜器。墓主人的人物特点可从两个方面相互印证。以此观之,亚长与商王室和其他商族高层,既然具有如此显著的差别,推定为不同族属,应该可信。同理,除了XZ7之外,亚长墓其他殉葬人应与墓主人同族。

亚长不是商族人,是埋葬在商王都的“外乡人”,可能是殷商西北邻境之人。亚长拥有一些富有北方部族特色的青铜器——具有与晋陕地区商代李家崖文化相同的文化因素,表明二者之间关系密切。李家崖文化是分布在今晋陕高原夹河两岸,与中原商文化并存且与商王朝长期为敌的一个族群所创造的考古学文化。其文化遗物中,具有大量“商式”青铜礼器,同时也有一些不同于商文化的青铜器、金器^⑤。这些非“商式”器物,却出现在亚长墓中。例如:亚长墓铃首铜觶M54:295与锥状铜器M54:451、452,分别与山西保德县林遮峪出土的商代青铜铃首铜觶、铃首锥状铜器^⑥形制非常接近。亚长墓马头铜刀M54:300、373,与山西灵石县旌介商代墓葬出土的马头铜刀M2:20^⑦、陕西绥德县塬头村商代窖藏出土的马头铜刀^⑧形制十分相似。亚长墓环首铜刀M54:301,与山西柳林县高红出土的环首刀^⑨、山西石楼县后兰家沟出土的环首刀^⑩等形制相似。亚长墓铜戈M54:223内部下侧有歧齿^⑪,与山西石楼县后兰家沟出土的铜戈^⑫形制相同。歧内铜戈还见于灵石旌介商代墓葬^⑬。类似铜戈20世纪70年代在殷墟孝民屯也曾出土过,但肯定不是殷墟流行样式。亚长墓卷首刀M54:87、88、94,形同陕西淳化黑豆嘴出土的卷首刀^⑭(图7)。

此外,这些看似不太起眼的小件青铜器,却往往配置有精美的龙形玉扣(珑),显示出主人对它们的珍视。还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亚长墓铜戈M54:126,内部有铭文“𠄎”^⑮,是此墓中唯

一不是“亚长”铭文的铜器。亚长墓铜戈铭文“𠄎”,夹在简化夔龙纹中间。这种简化夔龙纹夹族徽的装饰方式,还见于亚长墓M54:255、256、261、262等4件铜戈上面,但铭文皆为“亚长”。就是说,“𠄎”铭铜戈应该与“亚长”铭文铜戈一样,是在殷墟制造的产品,而不是一件“外来品”(贡品或战利品)。据统计,现有商代“𠄎”铭铜器计33例(爵15、觚5、簋5、鼎3、卣1、鬯1、盖1、鍳1、戈1)^⑯,亚长戈是唯一的兵器,即“𠄎”铭铜戈未见于殷墟以外的其他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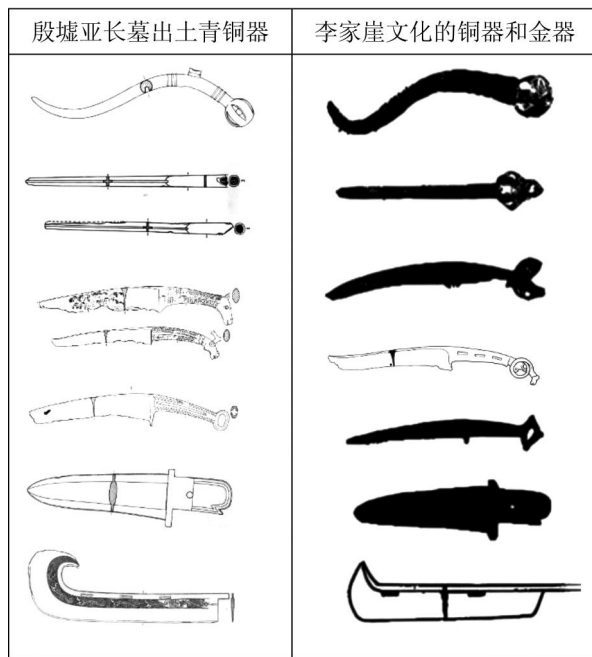


图7 亚长墓与李家崖文化器物对比图

据学者统计,商周青铜器中有60多件“𠄎”铭器物,年代主要在殷墟三期到西周早期,出土地点明确者包括山西太原、陕西岐山、河南洛阳和浚县、辽宁喀左等地。邹衡先生曾指出,商周“𠄎”铭青铜器之铭文“𠄎”,是青铜弓形器的象形,这种弓形器并非商式,而是特点鲜明的山西样式,可证太原、寿阳、保德、石楼等地青铜文化之间有密切关系。𠄎族是周人的一支,以𠄎为族徽,早期曾在太原一带活动,后来迁徙至陕西,商亡,其支流迁各地^⑰。查商代铜器铭文中,“弓”字也有一种书体近似“𠄎”(图8)。

“𠄎”字所象形的铜制“弓形器”,目前在山西至少发现3件。一件出土于原吕梁县石楼片罗村公社沙窑管理区桃花庄村商代墓葬,高17厘米、边宽3.5厘米,出土位置在死者头部,形似

弓,两边后部有穿孔各一个^⑨。一件出土于石楼县后兰家沟商代墓葬,通高13.5厘米、总宽24.5厘米,上有方首,两足尖外弯成钩^⑩。据说在石楼褚家峪也出土一件,上面镶嵌有绿松石片^⑪。在山西保德县林遮峪殷商墓葬中出土两件金质弓形器,叠放于死者胸部,两尖端各有一穿孔。一件高13厘米、宽29.1厘米、厚0.5厘米,一件高11.1厘米、宽26厘米、厚0.5厘米^⑫。这种“弓形器”,很可能是李家崖文化上层人物头戴的冠饰,其本形是兵器弓。李家崖文化人群因善制弓,以业为氏,以其为族徽,并用作冠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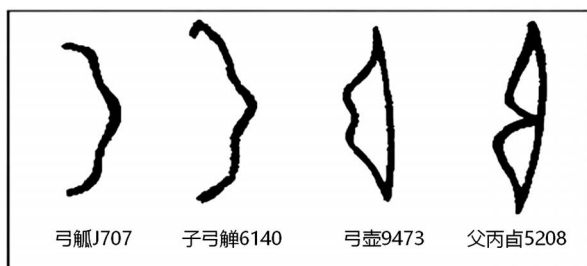


图8 殷商铜器铭文中“弓”字

1935年在殷墟王陵区发掘的祭祀坑HPKM2090中,埋葬6人,2人头南脚北,4人头北脚南,皆俯身葬。在头朝北的一人之头后肩部,发现一件玉冠饰,呈“𠂔”字形。上部周缘雕对称扉齿,器身透雕勾云纹;下部素面,出土时连接一些小绿松石片,横宽约21厘米^⑬。发掘者梁思永称之为“雕石冠饰”,认为是缀于冠前之装饰^⑭。石璋如也认为是玉冠饰,说“此玉冠饰不能单独的戴在头上,必须联在帽上”^⑮。这件玉冠饰,与李家崖文化铜、金冠饰非常相像,其区别仅是材质不同。其主人作为祭祀王陵的人牲,可能是“𠂔”族战俘。

“𠂔”形冠在山西侯马晋侯墓地出土的西周玉人头上曾有发现。如M8:184,人作站立状,头着高冠,作“𠂔”形,冠顶装饰为偏向一侧的勾云状。M63:90-15,“𠂔”形冠,冠顶作圭状^⑯。这是“𠂔”为冠徽、“𠂔”形冠晚至西周时期仍在山西南部晋国流行之证据。

在山西侯马北赵晋侯墓地西周末年“晋侯邦父”墓之次夫人(杨姑)墓M63中,出土一件大玉戈(M63:114),前锋尖锐,通体中脊微凸,阑有凸齿,长内3穿,内尾刻铭“邑凡伯弓”,通长56厘米、援宽9.4厘米。此戈体形硕大,工艺精

湛。发掘者指出,晋侯墓M64随葬五鼎四簋,正夫人墓M62为三鼎四簋,次夫人墓M63为三鼎二簋。M63看似礼仪规制最低,但随葬品却最丰富,总数达4280件,玉器即有800件^⑰。此玉戈之刻铭,也可证明当时当地有以“弓”为氏者。

在殷墟,存在一个“𠂔”族。该族徽曾在殷墟南区的苗圃南地M47、M58、M67,八里庄东M52,戚家庄东M269出土的青铜器上被发现。有学者指出,苗圃南地商代墓地共有50多座墓葬,出土青铜器上只有“𠂔”一种徽号,而无其他徽号,因此“这里就是‘𠂔’族在殷墟的族墓地无疑”。铸有“𠂔”徽的铜器分别属于殷墟文化二、三、四期,其中苗圃南地M47出土大铜鼎重达13公斤,造型浑厚雄壮,纹饰华丽美观,凡此均说明“𠂔”族在殷墟地位较高、存在时间很长^⑱。

殷墟戚家庄M269是一座殷墟三期的贵族墓,出土青铜礼器20件、乐器3件、兵器30件,其中25件铜器有铭文“爰”字,系人名或族名。一件铜器盖(M269:25),器体厚重,花纹粗犷,有铭文“𠂔”。一件铜戈(M269:50)形体较大,形状别致。在援、内之间,两面皆有向内倾斜的半圆形中部冒尖的装饰物,下部作尖帽状,上饰由两个对称夔纹构成的饕餮纹,“帽”顶对应着一个“𠂔”形^⑲,若与上述侯家庄M2090玉冠饰联系起来,恰为冠上有“𠂔”状饰。

《周礼·考工记》把手工业者分为6类30种,包括弓人、矢人等称“某人”者19个工种和筑氏、冶氏等称“某氏”者11个工种。“某人”“某氏”便逐渐演化为该族群的姓氏。张光直指出:“由于许多商代和先周青铜器上的图画符号被认为是氏族和世系的徽号,毫无疑问在这些徽号中有族名,并且许多族名都描绘了他们专门的职业。”他根据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族徽”文字,指出当时可能存在的十几种手工业^⑳,其中就包括了“弓人”“矢人”。因此“𠂔”族以制弓为业,属合理推定。

在山西省灵石县旌介村发掘的三座殷商时代墓葬中,出土一些商式青铜礼器,铭文以“丙”为主,同时也有其他铭文。M1为一椁三棺,葬一男二女,殉葬1人2狗,随葬青铜鼎2、簋1、尊1、卣2、罍1、鬯1、觶1、觚4、爵10、矛6、戈2、镞4、铃3、弓弣2、策柄1,陶鬲1,玉鱼1、玉管

3、玉璜1、玉饰1,石刀1,骨簇1,骨管1,鼉鼓1。M2为一椁二棺,葬一男一女,随葬铜鼎1、簋1、卣1、鬲1、觚4、爵10、矛19、戈11、镞16、铃1、弓弣2、策柄1、削1,陶鬲1,玉蝉2、玉鹿头1、玉燕1、玉琥2、玉蚕1、玉璧2、玉兔3,骨管1,骨璜1,贝2^⑤。M1、M2都随葬有一套兵器,包括弓弣、镞、璜、管等及其配件、马策等御器。弓箭、马策,都是商代车兵或骑兵常用兵器。三座墓的共同特点是都不使用发笄——无论是玉笄、骨笄还是牙笄。

《周礼·考工记》讲各地特色手工业时,提到粤、燕、秦、胡弓车,谓:“胡之无弓车也,非无弓车也,夫人而能为弓车也。”^[7]说胡人境内没有专门的弓匠和车匠,并不是说没有会制弓、制车的人,而是胡人几乎人人都掌握制造弓、车的知识和技术^⑥。胡人,指北方少数民族。

关于李家崖文化的族属,学者研究的目标主要指向了古文献记载的商代“鬼方”、甲骨文记载的商代土方和𠄎方。郭沫若曾考证说“土方与𠄎方二者与殷人所发生之关系最多,战争也最频繁、最剧烈;均远在殷之西北部”^[8]。邹衡则认为,石楼、永和地区发现的商代青铜文化遗存,并非商文化,而是“光社文化”(即李家崖文化),或与古文献所谓鬼方有关。“晚商的土方就在今天晋西的石楼县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了。”石楼、永和一带的青铜文化遗存,应该属于卜辞所说土方、𠄎方等^[9]。

因此,殷墟“亚长”与晋陕地区的李家崖文化关系十分密切。其关系实质,“亚长”或属于李家崖文化之族群,即土方、𠄎方之人,投靠商王成为降将,这种可能性很大;或者是作为方国首领协助商王对战李家崖文化族群土方或𠄎方,目前还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亚长墓随葬器物中,“亚长”铭铜戈与“𠄎”铭铜戈共存,且器形、纹饰完全相同,证明“𠄎”与“长”关系密切,“𠄎”可能是“长”原属氏族的族徽。

亚长墓随葬大量精美的弓矢类兵器,青铜弓弣有6件,铜镞881枚,玉镞3枚,骨簇43枚,玉璜5件。在殷墟,武士一人具备2件及以上铜弓弣(代表弓数)十分罕见,具有6件铜弓弣的例子,只有妇好墓和亚长墓。亚长似乎对于弓箭情有独钟。铜弓弣一般都配置有精美的玉璜

和玉、骨饰件,其器物级别一般较高。

从亚长拥有较多弓、矢、策和富有北方特色的短刀来看,其与北方民族有密切关联。另外,他披挂在身的铃首铜觶、四棱锥状铜器,还有手持的长杖,罕见于商族墓葬中,虽然多数器物的功能不甚明晰,但明显显示出与商族不同的特点。墓中数量众多的玉管,几乎遍布墓主人全身,从玉管两端磨成斜面看,其绝非那种依次串联成一个圈状的饰件,其连接方式非常特殊而复杂。这种现象也从未出现在殷墟商人墓中。

可以肯定,殷商时期铜器铭文中的“𠄎”铭,就是当时某族群流行冠饰的象形,是该族的族徽。如果说这种族徽来自该族善于制弓的特点,那么“𠄎”字便与弓密切相关。如果我们把亚长墓铜器铭文之“𠄎”与“长”同存于一墓铜器之上联系起来,弓、长并存,正可组成“张”字。由此,亚长出自西北边地之族群,善制弓,“长”衍化为“张”,也就顺理成章了。

结 语

殷墟亚长墓青铜器铭文中作为族徽的“𠄎”与本作为私名、后演变为族名的“长”共存,“张”字的两个构字要素已经具备。鹿邑长子口墓的主人“长子口”,属于殷墟“亚长”的后裔,可证“长”族延续到西周早期。西周青铜器铭文和《诗》文证实西周晚期已有张姓。春秋战国时代,张姓已广泛散布于我国北方地区。张姓作为汉族姓氏,其起源却来自商代周边族群,后来融合发展为汉族的一部分。就现有考古发现而言,与张姓起源有关的人群可能来源于山西太原一带,但张姓的真正形成地,还是要东移至商代晚期商族的核心地区——安阳殷墟及其附近区域。无论亚长是因为什么原因来到了商族的核心区域,但亚长墓铜器铭文之“𠄎”与“长”共存于一墓铜器之上,出现于殷墟核心区域,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我们可以明确,作为商族核心区的殷墟,才是张姓起源过程中信而有征的考古学起点。

注释

①吕大临:《考古图》卷三,吕大临、赵九成:《考古图·续

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图二六：1。④⑦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图二七。④⑧孟宪武、杨松山、李贵昌：《殷墟南区墓葬青铜器群综合研究》，载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博物馆编著：《安阳殷墟青铜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④⑨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戚家庄东商代墓地发掘报告》，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06—237页，图二〇三：1，图二三二：1，拓片13：12，彩版八一：2、八二：2。⑤⑩张光直著、毛小雨译：《商代文明》，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页，图48。⑤⑪闻人军：《考工记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276页。

参考文献

[1] 宋衷. 世本八种[M]. 秦嘉谟, 等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6.
[2] 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2675.

[3] 十三经注疏: 毛诗正义[M]. 阮元, 校刻.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910.
[4] 薛尚功.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57.
[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周口市文化局. 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0: 209-210.
[6] 天津博物馆. 天津博物馆藏玉[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2: 64.
[7] 十三经注疏: 周礼注疏[M]. 阮元, 校刻.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1957.
[8] 郭沫若.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60: 265.
[9] 邹衡. 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M]//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280-281.

New Evidence for the Origin of the Zhang Clan from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Du Jinpeng

Abstract: Zhang is one of the Han Chinese surnames, ranking 24th in the *Hundred Family Surnames*.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Zhang is currently the third most populous surname, accounting for about 7%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The origins of the Zhang surname have been interpreted differently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Existing literature,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show that the earliest ancestors of the Zhang surname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Shang and Zhou periods. In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from the Yachang Tomb at Yinxu, the clan emblem “𠄎” coexists with “Chang,” which originally served as a personal name and later evolved into a clan name, reflecting the two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the character “Zhang.” The tomb owner of the Luyi Changzikou Tomb, “Changzikou,” was a descendant of the “Yachang” clan from Yinxu, demonstrating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Chang” clan into the early Western Zhou dynasty. Bronze inscriptions from the Western Zhou and texts from the *Book of Songs* confirm the existence of the Zhang surname by the late Western Zhou period.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s, the Zhang surname had already spread widely across northern China. Although Zhang is a Han Chinese surname, its origins lie among ethnic minorities during the Shang dynasty, which later integrated and developed into part of the Han ethnicity. The discoveries of the Yachang Tomb at Yinxu and the Luyi Changzikou Tomb provide soli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that the early key stages of this process took shape in the Central Plains region, establishing Henan as a verified archaeological starting point for the origins of the Zhang surname.

Keywords: archaeology; origin of the Zhang surname; new evidence

[责任编辑/启 轩]